的重要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1830年以前，对外贸易提供了巨额白银输入（到1830年，大约有五亿墨西哥银元，占当时中国白银储备总额的百分之六、七十）。到十九世纪中叶，对外贸易又造成了白银枯竭，使白银对铜钱的比价不断上涨。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使用铜钱，而赋税须缴纳银两，这种上涨几乎对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。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1895年左右，海关收入成了中国各种自强计划的主要财源。

陈志让的结论是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失败，并不是因为信奉儒教的官吏们的腐败，任人唯亲或玩忽职守，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总体构思、科学头脑和协调的计划。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督抚互相之间及与中央争夺资金与权力的倾向。例如，当时中国有十六个小的、四个大的军工厂分布在各个地区，各地政府之间的缺乏统一造成了工厂产品的全然不同，武器弹药的型号无法通用。如此严重的不协调，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：是否确实存在着作者在他的标题上所提出的“国家经济政策”。

（译自《美国历史评论》88卷第3期，1983年6月）

学术动态

人大清史所召开清史学术交流会

江　宁

1984年7月12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了加强清史研究的信息，促进清史研究的开展，召开了清史学术交流会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、日本的专家学者，以及在京的科研、大专院校、文博、新闻出版、档案等单位的同志八十余人。大会由人大清史所所长戴逸同志主持，人大副校长李震中同志到会讲了话。这次会议没有论文，与会者就自己对清史感兴趣的问题，从不同的角度和内容，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

王思治同志（人民大学清史所）根据编写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一书，谈了两点体会。他认为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等人在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，但是他们有许多失误之处，如对汉人的政策、掠夺人口、破坏生产等等。其次，明亡清兴不能完全归功于一些个别的历史人物，它是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用的结果。

孔飞力教授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）以《乾隆朝的政治性犯罪》为题，他说这里不是研究政治性犯罪的内容，而是要研究它的手段，可以看到皇帝与地方官对政治性犯罪活动，各自持不同的态度，前者很需要，后者却讨厌，因而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制度的好办法。

王戎笙同志（社科院历史所）介绍了清史研究室的工作情况，他们为了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，做了三件事：一是抓专题研究，出了《清史论丛》；二是抓资料，编了《清史资料》；三是抓信息，与人大清史所合办了《清史研究通讯》。

狭间直树副教授（日本京都大学），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他们研究所在宫琦市定、安部健夫组织和领导下，整理雍正硃批谕旨的情况。这项工作自1949年开始，估计到1985年可以全部完成，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，编了各种索引、抄了各类卡片，这对研究清朝历史是有好处的。

王庆成同志（社科院近代史所）介绍了最近他在英国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重要资料，即《天父圣旨》（一本）、《天兄圣旨》（二本），这两部书记载了太平天国早期和中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无疑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。

戴福士副教授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），首先提出关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问题，他认为最好是用中国与中国、中国与亚洲、中国与世界这种模式。其次讲了他研究明末农民军李岩的情况，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人，但不是河南人，而是山东人。

穆黛安助教授（美国印地安纳州圣母大学），介绍她研究1790至1810年间的清代海盗问题，主要是研究海盗的组成、人数、规模、以及与天地会的关系等等。他认为海盗和天地会有相同之处，都不是反清复明，而是为了谋生，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。

朱金甫同志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），他谈了档案史料与清史研究的关系，认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，对研究清史十分重要，因此要大力加强整理、编辑、出版工作等，以推动清史研究。

盖伯坚助理教授（美国西亚图华盛顿大学），他介绍了自己研究乾隆的情况，首先是研究乾隆的性格，指出他与祖父康熙的宽厚、父亲雍正的严厉都不同。其次是研究乾隆的用人问题，认为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，喜欢用雍正时期落选的人。

曾小萍助理教授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），她述说了自己研究19世纪清代财政问题。首先指出不能用西方的现代化来看中国，因为东西方不同。其次认为雍正的财政改革措施中，火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胡绳武同志（人民大学清史所），讲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线索问题。他指出中国近代史从五十年代开始提出了分期问题，把它分成八个时期，三个高潮。到了八十年代，又提出了线索问题，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两种趋向，一种是向上，即向西方学习；一种是向下，即沦入半封建半殖地。因为把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——太平天国、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。他认为这种看法虽然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排除在外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

阎崇年同志（北京社科所），他介绍了六月份在广西滕县召开的袁崇焕学术讨论会的情况，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了袁崇焕的籍贯、军事思想、与东村党的关系、主和、斩帅和评价等问题。

王宏钧同志（中国历史博物馆）谈了关于清代行会的问题，他指出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看法，认为清代的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、手工业是封建的行会。但是根据乾隆六年广东佛山陶饰匠公议表，这是东西两行共同商讨的公价表，可见它已不是封建行会。据此是否可以说中世纪的行会已开始瓦解。另外，农村经济也有变化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业已动摇，因为此时农村出现许多基层市场，有些农民进行生产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，而是供给市场的需要，可见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。

马汝珩同志（人民大学清史所），他分析了清代社会为什么没有走上近代化的道路，首先指出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，可是清朝统治者不是向前迈步，走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，而是集我国封建制度之大成，这种落后历史的形成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个皇帝是有责任的。

此外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濮德培助理教授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）、文朵莲博士生（美国耶鲁大学）、王尧同志（中央民族学院）、朱家溍同志（故宫博物院）等。